

社会动员的变迁及内在机制

——以公益献血的动员研究为例

薛亚利

摘要: 自 1998 年实行无偿献血制度以来, 中国公益献血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以往学界往往将这种进步归因于社会体制、政府管理能力、组织结构或者献血者素质的变化, 这些解释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献血事业的特色和 经验, 但其视角却局限于过“大”、“偏”和“弊”。社会动员机制也可以作为公益献血事业进步的一个解释维度。针对献血的社会动员经历了政治动员、物质动员和主体动员的阶段性过渡和有效衔接; 在献血动员变迁的过程中伴随着动员意义的建构。公益献血进步的探讨, 不仅能反观社会动员的变迁, 而且管窥了社会动员变迁背后的社会转型。

关键词: 公益献血; 政治动员; 物质动员; 主体动员; 动员意义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5833(2011)07-0086-10

作者简介: 薛亚利,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上海 200020)

一、现象及已有解释

中国自 1998 年实行无偿献血制度以来, 无偿献血率从 1998 年的 22% 上升到 2005 年的 93.6%, 其中自愿无偿献血率则从 5% 上升到 79.4%^①, 短短数年内无偿献血率上升了近五倍, 而自愿无偿献血率则上升近 16 倍之多。中国公益献血事业的进步也得到了国际组织的认可, 2008 年世界卫生组织将中国视为榜样, 且在献血日的宣传活动中大力宣传中国, 使中国成为其他国家仿效的榜样^②。就中国的实际献血率来看, 由于没有官方公布数据难以知道确切的献血率, 但根据现有的献血数据推算高于 2.4%^③, 这一数据与欧美一些国家相比虽低, 如美国 1994 年的献血率为 4-6%^④, 2003 年美国的献血率为 8%, 2006 年英国的献血率为 6%^⑤, 但从我国

收稿日期: 2011-03-16

① 《卫生部公示今第一季度各省无偿献血比例及排序》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health/2005-06/14/content_3082931.htm, 2005-06-14。

② 《中国和阿联酋在安全献血方面取得迅速进展》, 世界卫生组织网,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news/releases/2008/pr18/zh/>, 2008-06-13。

③ 这个献血率的推算使用的是上海的献血数据, 由于上海的献血在全国的排名相对比较靠后, 因此, 全国的献血数据高于上海。上海数据推算办法, 献血率由献血万人份/上海常住人口总量得出。上海从 2007 才开始有无偿献血数据, 因此献血率也只能从 2007 年开始算起, 2007 年的献血率为 2.3%, 2008 年的献血率为 2.4%, 2009 年的献血率 2.4%。数据来源: 上海市统计局主编《上海统计年鉴 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 年版。

④ Lichang Lee, Jane Allyn Piliavin, Vaughn R. A. Call. Giving Time, Money, and Blood: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Vol. 62, No. 3, 1999, pp. 276-290.

⑤ McVittie, Chris and Harris, Lisa and Tilipoulos, Niko. "I intend to donate but ...": Non-donors' views of blood donation in the UK. *Psychology, Health & Medicine* Volume 11, Issue 1, 2006, p. 1.

较晚推行无偿献血制度这点来看, 成绩并不逊色。

中国的公益献血事业为何发展较快? 这也引起了国内外一些学者的关注, 他们从不同的关注点出发, 对中国的献血进步作出不同的解释。归结一下, 大致有四种看法:

第一种为“制度说”, 将公益献血事业的进步, 归因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因素。如欧文 (Erwin) 认为主要是社会制度的原因, 她从单位制分析入手将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划分为两个阶段, 即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阶段; 在社会主义时期, 公益献血靠计划指令得以保障, 在后社会主义时期, 公益献血则通过物质补偿及对个体自主权的尊重实现^①, 这一解释发现了公益献血进步的制度性因素。

第二种为“管理说”, 将公益献血的进步归因为政府的强效管理能力。与欧文的看法稍有不同, 文森则把公益献血的进步归因为国家的强效管理能力, 她从公共卫生危机的干预入手, 认为中国成功地控制了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艾滋病危机, 无偿献血的制度建立以及对血液买卖禁止等制度的实践, 既有效地控制了艾滋病蔓延的危机, 又将自愿献血的比例提到较高水平, 因此, 她认为在公共卫生管理上中国具有自己的特色经验^②。

第三种为“组织说”, 将公益献血的成功归因为组织因素, 认为中国的公益献血的组织结构具有易得性。通过对某大学的献血团体的调查, 余成普认为单位团体献血是献血的主体群体, 而这些献血者所在单位或团体的组织运作是公益献血的基础^③, 此外, 他还认为单位群体的流动会影响到公益献血的存储能力^④。

第四种为“素质说”, 把公益献血进步分析的注意力放在献血者的素质层面, 但这种看法存在争议。一种是素质提升观点, 认为献血者素质较高, 出于利他目的的人占到较高比重, 如献血者中“奉献爱心”者占 74.4%^⑤, 或“救死扶伤、奉献爱心”意愿者占 51%^⑥。当然, 素质论中还有一种批判性的看法, 认为受传统落后观念的影响人们的献血意愿实际上并不高, 一些地方的献血要靠政府下达计划指标来完成, 这种说法提供了一个信息, 即不能把对公众的献血意愿理想化。

应该说, 以上四种看法都在某个侧面揭示了那些影响公益献血的力量, 但就中国公益献血的进步来说, 作为一个经历变迁的跨越式进步, 仅仅归结为制度、管理、组织和素质, 这些说法难以阐明公益献血事业进步中所包含的关键的和丰富的多重转变。应该肯定的是, 无论是社会体制、政府管理能力、组织结构还是献血者素质, 无疑都是影响献血事业的重要因素,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献血事业的特色和经历, 但这种分析视角却局限于过“大”、“偏”和“弊”, 因而, 无法阐明公益献血事业进步的内在动力及其脉络性线索。视角之“大”, 如社会主义体制的分析, 尽管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框架, 但却难以把握更为微观的问题, 如无法阐释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之下复杂的制度实践, 以及制度变迁和社会分化造成的群体异质性增强对公益献血的影响; 至于视角之“偏”, 如政府管理和组织结构, 尽管以组织或管理为切入口, 但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观察视野, 无力分析公众献血意愿及背后蕴含的文化变迁; 至于视角之“弊”, 以素质论为例, 从献血者素质来看公益献血的进步, 从表面看起来最有解释力, 但其却有因果倒置之嫌, 因为献血主体素质的转变应该是一个历史性发展的结果, 而不是起因。因此, 应把献血者的素质较高作为有待解释的对象, 而把具有某种特征的献血者素质作为研究前提, 通过追溯利他公益献血

① Kathleen Erwin, Vincanne Adams, Phuoc Le, G. brious Deeds, Work Unit Blood Donation and Postsocialist Desires in Urban China *Baby & Society*, Vol. 15, No. 2, 2009, pp. 51-70.

② Vincanne Adams, Kathleen Erwin, Phuoc V. Le. Public health works: Blood donation in urban China,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8, 2009, pp. 410-418.

③ 余成普:《单位团体献血运作的过程与机制: 以北京市 T 大学为个案》,《社会》2010 年第 1 期。

④ 余成普:《作为组织问题的“血荒”: 一项社会学的探究》,《开放时代》2010 年第 1 期。

⑤ 罗凌飞、徐雁:《348 名献血者意愿调查分析》,《浙江预防医学》2007 年第 2 期。

⑥ 刘春梅、王利华:《济宁市 5800 名无偿献血者心态调查和分析》,《临床输血与检验》2005 年第 3 期。

意愿的形成过程，才能更加客观地分析公益献血进步这一事实。

二、新的解释视角——社会动员

献血，从其本质来看，是一个需要动员的行为结果，这既与献血行为的特殊性有关，也有传统血液养生观的难以直接形成积极的献血意愿有关。尽管有学者认为利他主义是人的本性，但公益利他并不是完全不考虑个人利益，说到底，它是一种关涉个人利益的行动（self-interested action）^①，献血作为一种行动具有某种悖论性，一方面，它更加关切个人利益，血液作为一种捐献资源，它来自于生命体自身，是身体的内在组成部分之一；另一方面，它又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献血捐献对象指向陌生人，重症的病伤者如孕娩大出血的妇女、严重贫血者、事故重创者以及许多外科和癌症患者等构成了用血者的主体^②，用血者和供血者之间是两相无知的陌生人；此外，对献血意愿的文化探源，揭示出消极献血意愿并非是简单的个人素质问题，它有文化上的根源，传统的血液养生观对失血持消极态度^③、儒家孝道对身体损伤的贬抑态度、中医对失血的消极认识以及养生文化中补血的饮食习惯等等，都造成人们对献血有着或多或少的顾虑。因而，公益献血就是在献血者和用血者缺乏天然关系的前提之下，如何让一个人自愿地为另一个陌生人去献血。同时要改变传统的保守的血液观念，以消除献血意愿中对失血有损健康的疑虑。显而易见，献血是一个社会动员（Social Mobilization）的议题。

从社会动员来看中国的公益献血，就是要分析它在献血观念的动员过程中实现了哪些转变；旧有的献血意愿如何被逐步改造，现代新型的献血观念和行为是如何形成和出现。这里有三层相关含义：

首先，社会动员如何型塑献血观念及行为。从本质来看，社会动员是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而这种现代化的过程则通过对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的改变来实现，有学者就认为当今社会是“动员的社会”^④，它不仅唤醒了民众的权利意识，而且刺激了民众的欲望需求；多伊奇（Deutsch）认为“社会动员是人们腐蚀和摧毁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上的主要信仰，开始接受新的社会化和行为模式”^⑤，从社会动员的型塑作用来看，就是要深入分析社会动员如何为公益献血赋意，传统的献血伤身的消极观念及行为如何被克服乃至逐步消解，而新型的积极的公益献血观念及行为如何被不断地建构。

其次，社会动员的不同形式对献血观念及行为影响不同。从社会动员来看中国的公益献血，就是要看到为了激发民众的公益献血积极性，社会动员具体采取了哪些动员形式，又发展出哪些新型形式。从历史实践来看，我国社会动员的形式经历了从政治动员到物质动员的转变，前者以阶级斗争及群众运动为导向，注重高远理想的培养，容易形成共识但难以持久，后者以追求物质

① Jane A llyn Piliavin Hong - Wen Chang Altruism: A Review of Recent Theory and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16, 1990 pp. 27- 65.

② 《我为什么应该献血?》, 世界卫生组织网, <http://www.who.int/features/qa/61/zh/>, 2007- 06- 13.

③ 文化社会学对消极献血意愿的解析，主要利用的是传统养生学的知识系统。研究发现传统养生观与献血无碍健康的现代观念之间具有内在的冲突性。具体来讲，传统的血液观认为血液来自食物的补给，血液是天人统合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因而血液为人体精华不可丧失；但现代的血液观则认为血液是内生的，血液属于人体内部相对独立的闭合系统，一定量的失血对健康无碍。具体见薛亚利《公众献血意愿的文化社会学解析——从献血食补看传统与现代观念的差异和冲突》，《公共管理高层论坛》2009年第8期。

④ 陈明明教授认为社会动员是认识中国社会和分析政治体制的重要视角，在具体论证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党体制形成的历史必然性问题上，他的“外患”和“内忧”之说富有新解。这体现在他对“内忧”的社会动员解释上，陈明明教授认为内忧应从社会动员视角来加以阐明，中国传统社会历来是缺乏动员能力的大众社会，建立新型的民族国家有对新型政治领导力量的期待和需求，这股新型政治领导力量必须担当社会动员的历史角色，中国共产党就是历史担当者的备选者和成功者，共产党的革命动员工作能够深入到偏远农村和各个基层，因而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尤其是组织动员能力。具体见陈明明《党治国家的理由、形态与限度》，载《共和国制度成长的政治基础》（复旦政治学评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页。

⑤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译，华夏出版社版1988年版，第34页。

利益为导向的物质动员由于利益关系复杂化反而会损害动员能力^①,那么,政治动员和物质动员在公益献血的动员效能如何?是否会发展出新的动员形式?

再次,社会动员的变迁,嵌入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动背景之中。国家-社会关系是把握社会动员的有力分析框架,中国正经历从“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转变,这就决定了社会动员的变迁走向,也决定了社会动员各种要素的变化,动员对象从高度统一的一元化社会向原子化个体、多元化社会发展;动员轴心从爱国主义、政治压力向爱国主义、政治压力、个人利益方向发展等^②,那么这些动员变迁是否在公益献血中有所体现?

从以上分析来看,社会动员的路径分析具有明显优势。从社会动员来看公益献血,就是探讨政府如何调动普通社会成员的献血积极性:一方面,社会动员分析视角对动员对象的重视,将会较深入地解析公众的献血意愿状况,这里既会考虑既有的意愿状况,也会考虑到社会变迁背景下这种意愿的变化;另一方面,社会动员的分析中对动员形式的重视,将会较全面地考察不同制度背景下不同动员形式的运用及其变化。具体而言,社会动员能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深入。首先,能将制度实践的分析推向深入,社会动员通过综合分析动员要素之间的关系来具体反映制度实践及其过程性,社会动员中的分析要素有动员主体及其采用手段、动员对象如献血者及其态度转变,以及社会动员的阶段性的;其次,不同动员方式的分析,将更有效地分析社会动员的内在机制;再次,突出动员对象的能动性,适龄健康的普通民众作为潜在的献血者,作为献血动员的对象,其献血态度到底是顺从动员还是对抗动员都须加考虑。总之,社会动员的分析维度,既能沿用已有研究中的制度及实践分析路径,又能充分考虑到献血主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做到“下”和“上”统合,兼顾制度实践和主体意愿,它把制度变迁作为一种实践过程而不是简单的时间脉络,通过动员目标、内容及其手段的变化几个侧面,来反映献血制度以及民众献血意愿的延续性变化。总之,针对公益献血的事业进步,社会动员提供了新的解释路径,尤其是关于社会动员形式及其变迁的研究,为献血的社会动员的分析提供了关键的着力点。

本研究所使用资料,来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重点课题“献血观念及其行为的文化社会学解析”访谈数据,该课题调研历时两年完成,共访谈87人,其中2007年完成主体调查,共访谈77人,2008年又做了补充调查,补充访谈10人。访谈分个人和团体访谈两种,本人参与了6人的访谈,其余由多次培训的调查员通过入户访谈完成。调查样本来自上海市的6个区,样本的选取综合考虑了献血经历、性别、年龄、职业和收入等因素的均衡,调查对象既包括献血者也包括未献血者。访谈的具体内容涉及对献血与健康、献血经历、有关献血的知识、行为及意愿和献血与用血安全等,这些内容都与献血的社会动员紧密相关。

三、献血社会动员的变迁

献血的社会动员,就是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动员办法,以应对基于传统文化心理的保守献血意愿。本次调查印证了被访对献血的疑虑态度,有1/3的被访认为献血会对身体有消极影响,有被访直接说:“(献血)或多或少都是影响(身体健康)。(影响)不会是短期的,我认为这种影响是一辈子的事情。”^③有被访因瞒着家人去献血,事后遭到家人批评“……首先劈头盖脸的骂我一顿。”^④的确,这种传统保守的献血意愿使社会动员成为首要前提。

通过对不同年代献血者对献血经历的记忆回溯的深入分析发现,针对献血发展出来的社会动员大概有三种主要的方式:早期阶段的政治动员、过渡阶段的物质动员和新兴的主体动员,下面分别予以论述:

① 刘一泉:《社会动员形式的历史反观》,《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4期。

② 夏少琼:《建国以来社会动员制度的变迁》,《唯实》2006年第2期。

③ 个案19,男,38岁,初中,自由职业者,未献血。

④ 个案16,男,31岁,大本,公司法务主管,2001年献血。

1. 政治动员

献血的政治动员, 实行于建国之后和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它主要通过宣扬政治忠诚或施加政治压力使其高过个人的健康忧虑成为献血的主要动机。我国 1979 年确立义务献血制度, 而这种献血制度其实就是对以往献血政治动员方式的经验总结, 这种制度的理念是“献血是每个健康适龄公民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光荣职责”^①。这种献血的政治动员, 与建国初期中国的政治化生活紧密相关, 当时献血被赋予了几种特殊的政治意义:

首先, 献血被赋予革命人道的光荣意义, 献血意味着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保卫和支持。抗美援朝期间, 为医院受伤的战士献血的人认为:“我献血就是打击美帝国主义的实际行动。把猪肝给伤员吃吧, 让他们养好身体去打敌人”^②; 其次, 献血被赋予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支持意涵, 一个工厂失火, 为救火受伤者献血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者和保卫者的直接救助, 这种动员的效力很强, 在需求血液的紧急时刻, 通过贴大字报和签名的方式就可以召集大量的献血者^③; 最后, 献血被赋予团结和友谊的阶级内涵, 供血者和用血者之间具有一定的政治关系, 献血是阶级兄弟间团结和友谊的表现, 因此, 在一个先进生产者需要继续用血时, 献血者众多, 有些人为了能够献血而隐瞒体重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且备受称赞^④。这在我们的访谈调查中也有所体现, 如先后献过 5 次血的一个被访者, 他认为献血主要取决于各自的思想境界, 说起自己的献血“单位一动员, 就高兴地去献了”^⑤。

然而, 就献血的政治动员而言, 这种带有崇高理想激发的政治动员并不一定总能奏效, 因而, 一种带有政治压力的政治动员也辅以存在。个案 9 谈起她在 1978 年献血“是单位动员的, 那个时候思想境界没有这样高”^⑥。具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和政治理念, 特别在革命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时期, 保持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忠诚, 理想激发的政治动员手段能够发动人心, 但随着中国局势的稳定及经济发展, 这种政治忠诚作为社会成员的素质要求却难以持久, 那么, 为了保持医疗的基本用血需求, 施加政治压力开始成为主要的政治手段, 献血开始作为一种行政任务被指标化, 献血量及人数被统一计划, 通过单位体制具体落实到个人, 在单位指标的压力下, 不愿意献血的人, 对指标难免会有畏惧心理, 有被访问者说:“我们厂里是有献血任务的, 要摸彩去的。那次我是第一个摸的, 摸好以后就是不敢把纸头打开来看。”^⑦

然而, 无论是以激发崇高思想为主的政治动员, 还是施加压力的政治动员, 两者都无法真正消除献血伤身的传统观念。的确, 在中国的特殊时期的政治动员, 人们要么出于崇高思想或政治理念而献血, 要么出于一定政治压力而献血, 这只能说思想信仰和政治压力高出个体对健康的忧虑, 然而, 这种“高出”只是一种暂时的超越, 它不能彻底消除人们对献血伤身的疑虑, 如上面提到的那些为医院受伤的战士的献血者, 把具有补血功能的猪肝留给伤员吃, 这就显示出献血者出于崇高无私的思想, 献血者才把紧缺的补血食物让给了失血多的伤员, 在他内心依然存在有对失血的某种忧虑。

2. 物质动员

为了能够安抚献血者对伤身的忧虑, 出现了一种针对献血的物质补偿, 这种物质补偿实际上就是献血物质动员的具体体现, 在本次调查中发现这种物质补偿有三种形式: 一是直接发放补养身体的食品; 二是休假, 提供一定的时间来休养身体; 三现金补偿, 多用于购买营养品, 通常支付的现金要高出实际购买营养品的价值。须加以说明的是, 这种物质动员的方式从来都没被大力

① 《钱信忠在输血工作座谈会上说, 将逐步实行公民义务献血制度》, 《人民日报》1979年12月15日。

② 李树村:《烈火真金》, 《人民日报》1958年11月4日。

③ 南方日报记者和通讯员集体采写:《向具有崇高共产主义风格的人致敬》, 《人民日报》1960年3月15日。

④ 董尔昌:《党领导我们创造了奇迹》, 《人民日报》1960年6月9日。

⑤ 个案 1, 男, 57岁, 中专, 商业职工现已退休, 最后一次献血是 1979年。

⑥ 个案 9, 女, 48岁, 初中, 普通工人, 最后一次献血是 1978年。

⑦ 个案 39, 女, 54岁, 初中, 服装厂工人, 未曾献血。

倡导过。

物质动员作为一种动员手段，在献血的组织动员工作中程度不同地被加以运用。调查中发现，献血物质补偿的多寡与组织单位的经济状况和福利水平有关，凡是福利待遇好的单位，献血所获补偿就会高些，而福利待遇低的单位，献血补偿就会少些，个案14说起自己当初献血几乎没有补偿，而自己弟弟在1996年献血所得的补偿却很高：“他们那时候是可以休息3个星期、免费旅游一次、还有2000块钱，……他们领导还专程来看望他。”^①

物质动员作为一种动员手段的存在，弥补了政治动员手段的不足。单靠激发政治理想或施加政治压力，难以真正消除人们对失血的忧虑，受制于这种“失血有损健康”的传统观念，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变革中，个人的利益变得明晰，人们完全有理由选择以健康为上从而拒绝献血，但物质动员给出了新的献血理由，即献血后的身体受损可以获得物质上的补偿，这种补偿有多种表现形式，如营养食品、假期和现金，这些都非常有助于献血后的身体恢复。

物质动员的存在，具有先天的合法性和后天的合理性。献血的障碍性观念是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失血伤身”的传统观念，是牵制献血积极性的顽固性障碍，物质补偿的存在，可以让献血者名正言顺地补养身体，那么，在政治动员中政治理想激发难度的增加以及施加政治压力难度提升的背景下，以突出物质补养为目的的物质动员，无疑具有一定的动员效能。个案39说起自己弟弟的献血：“我弟弟是在崇明农场里去献的血。他倒并不是积极，他不是党员，只是一时冲动，主要是为了钱。”^②物质补偿存在最强的现实基础，乃是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强调团结和奉献理念的政治动员，开始受到公平交换的观念的影响，在献血的动员上，五六十年代，那种激发崇高理想的政治动员已与现实有些脱节，在市场经济的理念之下，血液，作为一种个体稀有资源，其让渡需要相匹配的回报，于是，针对献血的物质补偿的给予，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然而，物质动员与献血公益目的取向具有冲突性，这也是物质动员的局限性所在。物质动员的目的，表明上看起来是为了安抚人们对献血的忧虑和献血后的身体补养，但由于物质补偿的价值与身体补养所需物品的价值之间比例不当，一般也高出后者，这使得物质动员成为实际上的物质激励，这似乎暗示物质动员采用了购买行为，对献血公益目的的宣扬无益。

3 主体动员

20世纪上半期，自愿无偿献血已是世界各国的主流和通行做法，我国自1979年实行的义务献血制及其指标化的执行模式已显得不合时宜，随着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单位制不断解体和各种私有组织的出现，这导致分配指标的单位执行模式面临挑战；同时，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的增长，也让献血越来越成为个人的自主选择，在此大背景下，我国于1998年正式推行无偿献血制，新的献血制度需发展新的动员方式；另外，以往的政治动员和物质动员，都不能彻底消除人们对献血伤身的忧虑，为了有效地激发献血意愿，必须发展出与以往动员方式不同的新型动员方式，主体动员的方式应运而生。

所谓的主体动员，乃是尊重献血者作为主体所持有各种可能态度，尤其是可能的消极态度，针对献血者已有的意愿状况，通过献血无碍健康的最基本知识宣传实现献血知识储备的系统更新，以期破除人们在献血意愿上的忧虑，从而提升人们献血的积极性。这种主体动员有两个特点：一是尊重献血者的多元态度，把献血者中潜在的消极意愿作为献血动员工作的出发点；二是突出知识宣传对激发献血意愿的重要性，通过发展出新的知识系统，尽可能地使用多种形式的知识宣传如书刊、报纸、广播和电视媒体等，在社会层面大范围地推动献血公益行为的扩展，这两个特征都与当前的无偿献血制度相契合。

① 个案14，女，34岁，大专，公司职员，曾在1993年献过血。

② 个案39，女，54岁，初中，服装厂工人，未献血。

谈起献血的主体动员，它通过多元知识媒体的宣传来更新献血知识的特征在调查中得到相应体现。在访问员询问“听说或看到过有关献血的广播、电影、电视、报刊、广告或宣传手册(包括名人的)吗?”有被访回答“看到过、也听到过的。经常家里的信箱里开出来，就有献血的小册子，小册子里就有关于献血不会影响身体健康，……，电视里也有这方面的宣传的。这些宣传很多的，我们都晓得的。”^①的确如此，如今上海，地铁和公交广告中时常能够碰到献血的宣传。

从主体动员方式的实践后果来看，其效能已有所显现。调查中发现有不少被访已能用有关血液的科学知识来解释献血。如个案 61“我认为身体本身是有新陈代谢的，你的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本身就有一种生理代谢，我们现在的义务献血本身就是在一科学理论范围下。”^②，而个案 55的认识更加积极“觉得献血对身体是有利的，……，你适当的献血，反而会促进人的造血功能。”^③

调查中，还发现了献血观念上的趋势性转变，已有相当部分被访者的献血意愿从消极转变为积极，如调查中有被访者表示“(我对献血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为什么呢?我父母一代人没有献过血，他们是有思想顾虑的。”^④的确，调查中有部分被访者已开始转变观念，更为可喜的是，他们已能用一些科学的医学知识加以解释，这暗示了普遍民众对献血的健康忧虑在不断地缓解，当然，这也是献血的主体动员方式效力的最佳说明。

四、献血社会动员的内在机制

研究献血社会动员，须探究动员的内在机制，探讨它通过何种方式实现了献血观念及行为上的转变。亨廷顿认为动员就是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上的主要信仰被摧毁，新的社会化和行为模式被接受的过程^⑤，因而，仅仅以抽象的利他主义作为动员机制的分析框架^⑥并不充分，传统养生文化及养生习惯对献血积极性的滞性影响，作为社会动员的首要障碍应予首要的重视。

纵观献血动员方式的三次接替变革，无疑都在围绕一个主题，即为了克服和消除的传统文化心理障碍，逐步发展出行之有效的动员方式，同时，为不同动员实践建构意义，至此，我们才能管窥公益献血事业发展的内在张力和衍生动力来自于社会动员的内在机制：

1. 动员方式的历史更替

就献血动员的三种方式而言，政治、物质和主体动员三者之间有机组合，共同作用于民众的献血意愿的动员，具体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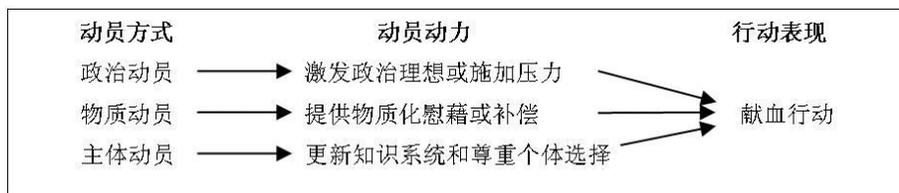


图 1 三种动员方式在献血行为中的有机结合

首先，就有动员的效能而言，有着效力上的总和效应，它来源于三种效力不同动员方式历史性的接替。对于献血的社会动员而言，表面上看是三种动员方式的变化，分而论之，三种动员方

① 个案 11，女，52岁，高中，管理工作，曾在 1987年献过血。
 ② 个案 61，女，32岁，硕士，市场部经理，曾在 2008年献血。
 ③ 个案 55，男，27岁，本科，质检专员，最近一次献血是在 2008年。
 ④ 个案 38，女，47岁，高中，服装厂教练员，曾在 1980年代献血，支持丈夫 2002年的献血。
 ⑤ [美] 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华夏出版社 1988年版，第 34页。
 ⑥ 余成普：《单位团体献血运作的过程与机制：以北京市 T大学为个案》，《社会》2010年第 1期。

式的效力特征,其优劣各不同,政治动员虽能提升献血意义但难以持久,须辅以一定的政治压力;而物质动员,降低了献血的意义但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因而迎合人们公平交换的心理;主体动员,宣传倡导新的血液观念,提高人们对献血行为的理性判断能力,这种动员方式起效时间长但效力更为长久。在献血的动员上,三种方式的历史更替其实是一种能动的调整,这对献血动员来说,无疑是一种持续的动力。

其次,献血社会动员的进步性体现在从政治动员过渡到主体动员,但这种进步性却是建立在物质动员的桥接基础之上。的确,就动员效能的长期性而言,主体动员的效果无疑最值得推崇,因为它从根本上正面回击了有碍献血积极性的传统文化观念,面对献血是否影响身体健康这一关键问题,主体动员给出了“是”或“否”的最明确回答,主体动员无疑提高了献血行为中理性选择及决断能力。

再次,献血三种动员方式的历史更替及实践上的互补关系。在社会动员的实践中,其实很难确切划定三种动员方式之间的清晰界限,三者之间构成不仅是历史性的接替,而且也是互相补充,在政治动员方式实行时期,物质动员在以微弱的形式起作用,那些针对补血的物品补给就是一种原始的形式;而主体动员的今天,政治动员也没有彻底消失,在一些事业单位中,政治动员还会以计划无偿的遗留形式发挥作用。另外,在政治动员和物质动员时期,主体动员也是以一种非主流的方式存在。

2 动员方式的有效衔接

社会动员的总体效能,与不同动员方式之间的有效衔接紧密相关。在社会动员的具体实践中,三种动员方式的并行不悖,也意味着某种动员方式为了能与其它方式有效衔接而做出调适,由于物质动员在三种动员方式处于中间阶段,我们以物质动员独特桥接作用加以说明。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被访对物质补偿的认定有两种特殊意义,这些都超出了物质含义本身。

第一种,物质补偿被视为来自国家或组织内部的关心和慰问,具有内部团结的情感色彩,体现了整个社会体制的特色。针对献血所获得的补偿,1991年献血的个案6说“不是报酬,不好这样讲的!只能讲是单位领导的关心,同事之间的情感,是人文关怀”。没有献过血的个案5认为补偿是“是领导和同事的关心友谊,是很人性化的”^①。而1993年献血的个案14的话最有代表性:“我觉得如果有补偿能体现我们制度的完善和人性化。”在这里,物质动员的物质并不仅仅是物质,而成为一种情感表达的手段,一种来自组织对其内部献血者的“慰问”和“关心”,这种物质补偿被赋予了更多的情感色彩。

第二种,物质补偿的精神价值来自献血行为本身及其意义阐发,是对个体价值的肯定。献过四次血的个案56对补偿如此看:“应该稍微给些补偿。……不一定要是经济上的,可以对他进行一些公司内部的表彰。”^②持这种观点的献血者们能够接受更为灵活多样的献血表彰活动,如口头或书面的张贴“表扬”或证书等,因为这些更能体现对献血者的精神激励或情感慰问。在这里,物质动员的物质超出了原有的物质含义,成为了一种价值认定的手段,一种来自开放性社会对献血者的精神嘉奖,这种物质补偿又带有一定的精神意蕴。

总之,物质动员中的物质意义的双重性,体现了献血社会动员的内在机制及其实践过程的延续性。尽管物质动员对各种实物补偿有着一定的凭借,但这种物质凭借并没有局限于简单的物质层面,正源于此,物质动员才能在意义层面与前后两种不同动员方式之间有所贯通,物质动员既存留着此前政治动员中的政治关怀,又蕴含着新型主体动员中的个体尊严:当它的意义表现为来自国家或单位成员的慰问和关心时,它在外延上与最早的政治动员有所联系;然而,当其意义体现在对献血个体的付出价值肯定时,它却与当前的主体动员有所衔接,因此,政治动员、物质动

① 个案6,男,51岁,大专,公务员,曾在1991年献过血。

② 个案56,男,26岁,中专,直销员,最近一次献血是2008年。

员和主体动员，三者是在藕断丝连的关系基础上实现逐步的过渡和转变。

3 动员意义的建构

献血社会动员的机制，不仅仅体现在各种动员方式关系运行特征上，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体现在对动员意义的建构上，这种建构有力地配合献血方式的转变，共同作用于献血社会动员的实践过程。

以献血动员方式的变迁为脉络，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动员意义的建构轨迹，以对传统滞性献血意愿的对应关系上，经历了悬置-回应-重建这三个阶段，而且，这三个进阶力度依次推进，具体如图示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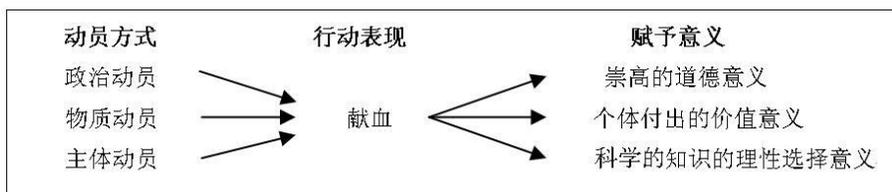


图 2 献血社会动员意义的建构

首先，政治动员阶段，献血被赋予了崇高的道德意义，它被视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奉献、保卫和支持象征，而且，献血还富有阶级同盟内涵，这让献血带有鲜明的制度关怀和人际道义色彩。但是，这种动员方式对传统的献血意愿缺乏正面回击，它只是用更高层的意义来暂时性压倒人们对献血的忧虑，传统血液养生观的问题被悬置。

其次，在物质动员阶段，献血者可以以个体名义得到各种形式的补偿，这种补偿肯定了个人付出的价值，然而，物质回馈的形式贬损了献血公益的道义取向，更为隐蔽的是，物质动员对献血意愿的顾虑的应对办法，其实是一种纵容，身体补养目的取向实际上支持了传统观念中对献血失血的消极观念。

最后，在主体动员阶段，动员的重点放在了知识系统的重构上，献血无损健康的科学知识宣传及理性意义成为动员工作的着力点。就传统献血伤身观念的破除和消解而言，此举无疑是切中要害的，启动了对传统的血液养生观的根本改造，它明确地否定献血对健康有损，认定献血符合血液的新陈代谢规律，以知识供给的方式提高了个体的理性选择能力，最终促进个体献血的积极性。

总之，从政治动员、物质动员到主体动员，完成了从科学知识角度来重新解释献血行为的知识建构过程，就献血意愿而言，它既剥离了其中旧有的传统血液养生观，又在其中构建了新型的献血知识观。

结 语

通过对献血动员的系统解析，这让我们对献血动员的理解，至少应有以下三点值得关注：

第一，关注献血动员的人本意义。在理解中国的公益献血事业的显著进步问题上，社会动员的分析无疑具有独特的优势，无疑要比大的制度框架分析或献血制度变革更具有说服力，这源于社会动员视角的人本取向，即对献血主体及其意愿的关注，作为被动员的对象，社会中个体无论献血与否，他们都是潜在的献血者，他们对献血意义的认定，他们的意愿状况及其态度转变，乃是公益献血事业的基础，因此，对公益献血事业的宏观视野，绝对离不开对个体献血意愿的细察，而这种献血意愿的高低，也许与素质无关，而是与社会动员的进程有关。

第二，关注社会动员的运行机制。社会动员的研究，既不能仅仅关注社会动员表面上的变化，也不能仅仅触及社会动员中使用的各种方式变化，这种理论层面的推演，离社会动员实践的

经验层面较远,因此,要真正了解社会动员,就不但关注其变化,而且还要辨析不同社会动员方式的优劣,要关注其兴衰的发展动态,还要关注相互间的内在关联,即要探究社会动员的运行机制,只有通过这种作用机制的发现和追讨,才能更加全面地解析社会动员及其效力。

第三,关注献血社会动员的意义变动取向。就献血的社会动员而言,尽管经历了政治动员、物质动员及主体动员的变化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最后一种动员方式就是最高的进阶,正如政治动员和物质动员既具有积极性也具有局限性一样,主体动员也会其自身的局限性,就目前的实践来看,它是“破”有余,而“立”不足,可以肯定的是,它能正面对献血意愿中的消极面且能予以尊重,采用较文明的知识媒介手段来回应传统观念,但令人忧虑的是,它对献血意义的阐发上还不够明晰,与以往政治动员中的那种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政治理想及信念相比,目前的主体动员还缺乏明确的价值基础。

不过,目前献血主体动员还有一种新趋势,即献血意义开始与公民社会的发育有所联系,“无偿献血是每个公民的职责”,从社会转型及公民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来为献血赋意,无疑是一种更为进步的意义定位,但这种献血的意义还没有系统阐发,还难以灵活地运用到主体动员的实践活动中去,因此,主体动员的意义根基问题,到底是寻根于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还是嵌入到公民社会的发育?这是献血社会动员的进一步发展的挑战之一。

(责任编辑:薛立勇)

The Changes of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Interior Mechanism — Analysis on The Mobilization of Public Blood Donation

Xue Yali

Abstract The progress of public blood donation was attributed to social mobilization.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interpretation dimensions of "social system", "governmental management" and "human quality", this paper highlights on the dimensions of social mobilization, there are two aspects about the reason: on one hand, three different type of social mobilization including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material mobilization and subjective mobilization on blood donation succeeded one another and formed cohesion which constituted the special mechanism; on the other hand, the given meaning in the course of social mobilization was subject to change and was transformed.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n public blood donation, we can not only understand the changes of social mobilization, but also take a comparative view on social transition.

Keywords Public Blood Donation; Political Mobilization; Material Mobilization; Subjective Mobilization; Meaning of Blood Donation